

郑观应的农业思想初探

钟祥财

郑观应(1842—1922)^①,亦作官应,字正翔,号陶斋,别号杞忧生、慕雍山人、罗浮侍鹤山人等,广东香山(今中山)人。1858年(咸丰八年)应考不第,赴上海习商,在柯化洋行帮办商务。1860年进宝顺洋行当买办,同时经营自己的茶栈、船运等业务。1874年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任总理。1879年被李鸿章委派为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(后升任总办)。1881年兼任上海电报局总办。次年离开太古,到轮船招商局任帮办,后任总办。1891年被李鸿章委为开平矿务局总办。1893年夏任轮船招商局会办。1896年兼任湖北汉阳铁厂总办。1897年被盛宣怀委派为铁路总公司总董、电报局总董。1906年被广东商民公举为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。在这期间,郑观应还参加过抗法战争,并创办经营钱庄、商号、航运等企业。

在中国近代史上,郑观应还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。他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写政论,1873年出版第一部著作《救时揭要》。后来又撰写《易言》36篇,由王韬于1880年在香港代为出版。在此基础上,他又将文稿扩充改编成《盛世危言》5卷本,于1893年印行。继而又于1896年印行14卷本;1900年再次将8卷本付梓。1909年,他又出版了《盛世危言后编》。郑观应的论著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,他的《救时揭要》和《易言》曾流传到日本和朝鲜,而《盛世危言》则深刻地启蒙了一代国人,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的思想。^②

作为一位论著甚宏的思想家,郑观应的经济理论十分丰富,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,他以提出“商战”论而著称,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是在于“以商立国”,而中国“欲制西人以自强,莫如振兴商务”^③。面对外国的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,他主张努力发展国内经济,凭借实力以与外国列强“决胜于商战”^④。重视商业是中国近代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共同倾向,这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社会思潮的转变规律所决定的。值得指出的是:郑观应在强调重商的同时,并未忽略农业发展问题,而是从实现中国经济模式变革的角度出发,提出和阐明了一系列农业经济振兴的理论和政策建议;因而在中国近代农业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。

对于农业的基础地位,郑观应是有所认识的。他在论述国民经济各部门关系时有一段名言,谓:“商以懋迁有无,平物价,济急需,有益于民,有利于国,与士、农、工互为表里。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,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,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,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,而握四民之纲领也”。^⑤这一见解对工、农、商的经济职能的表述是清晰无误的,其偏颇在于将流通置于生产之前来加以强调,这同他的重商思想直接有关。但另一方面,他又肯定商业的基础在于生产,指出:“富出于商,商出于士、农、工三者之力”^⑥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商业的重要性在于其能实现价值,而价值的产生则在于工、农等部门。这就使他的农业发展主张,建立在内在的理论基点上。

在这一思想支配下,郑观应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。他指出:“中国伊古以来,以农

桑为本，内治之道，首在劝农。阡陌广开，闾阎日富”^⑦。他主张在发展国民经济的整体规划中，“以农为经，以商为纬，本末备具，巨细毕赅，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，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”。^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。众所周知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以自然小农经济为本，以商业流通为末，这种陈旧的本末观在近代受到了冲击。郑观应在这里重提以农为本，以商为末，自然不是理论上的倒退，而是标志着本末观上的否定之否定。因为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出发，郑观应对传统的小农自然经济是持否定态度的，他曾深刻指出：“中国以农立国，外洋以商立国。农之利，本也，商之利，末也，此尽人而能言之也。古之时，小民各安生业，老死不相往来，故粟布交易而止矣。今也不然，各国并兼，各图利己，借商以强国，……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？”^⑨这就是说，封建的农本论只适用于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，在现代经济中，这种观点必须加以变革，代之以全新意义的农本概念。

为了提高农业的社会经济地位，郑观应参照欧美各国的先例进行了强调。他在分析欧美诸国的农业发达的原因时认为：“讲农学，利水道，化瘠土为良田，使地尽其利”^⑩，是首要的经济之策。为此，他对中国“近世鲜有留心农事者”^⑪的现象表示了忧虑和批评。

郑观应农业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主张仿效欧美各国，实施现代的农业生产方式。他详细介绍了外国对农业经济制定的政策及其科技应用，如“泰西农政皆设农部总揽大纲，各省设农艺博览会一所，集各方之物产，考农时与化学诸家详察地利，各随土性，分种所宜。每岁收成自百谷而外，花、木、果、蔬以至牛、羊畜牧，胥入会考察优劣，择尤异者奖以银币，用旌其能”^⑫；西人考察植物所必需者曰磷、曰钙、曰钾。……还有用电之法，无论草、木、果、蔬入以电气，萌芽既速，长成更易，则早寒之地严霜不虑其摧残，温和之乡一岁何止于三熟，是诚巧夺天功矣；“农部有专官，农功有专学。朝得一法，暮已遍行于民间。何国有良规，则互相仿效，必底于成而后已。民心之不明以官牖之，民力之不足以官辅之，民情之不便以官除之。此所以千耦其耘，比户可封也”^⑬，等等。

为了学习吸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，郑观应建议：委员赴泰西各国，讲求树艺农桑、养蚕、牧畜、机器耕种、化瘠为腴一切善法，泐为专书，必简必赅，使人易晓”。^⑭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出国考察农业经济的主张。同时，他还从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配置上着眼，强调新式农业生产的实施和管理，指出：“我国似宜专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，参仿西法以复古初”。^⑮“每省派藩、臬、道、府之精练者一员为水利农田使，责成各牧令于到任数月后，务将本管土田肥瘠若何，农功勤惰若何，何利应兴，何弊应革，招徕垦辟，董劝经营，定何章程，作何布置，昧不得假手胥役，生事扰民，亦不准故事奉行，敷衍塞责”。^⑯

对于中国农业生产的具体安排，郑观应只是提出原则方针，他认为在生产过程中，首先要注意选种，然后要贯彻因地制宜的原则，指出：“良法不可不行，佳种尤不可不拣。地属高亢，则宜多种赤米。……若卑湿之田则宜种耐水之稻。……其余花、果、草、木皆当审察土宜，于隙地广行栽种。如牛、羊、犬、豕之属，皆当因地制宜，教以牧畜，庶使地无遗利，人有盖藏”。^⑰

在改良中国农产品种方面，郑观应还注意到借鉴外国技术和移植外国良种的问题。他曾广为收集有关资料，潜心研究美国植棉技术，把“栽植、耕锄、除害、收花、去子等法录成一帙，名《美国种植棉花法》，付诸于民，以备当道及总理纱布局者讲求天时地利、购子广种”。^⑱

开垦荒地是发展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，也是郑观应加以专门论述的议题。他对中国农业的宏观势态作过这样的分析：“以天下大势论之；东南多水，农功素勤水利，农田宛存古意，故漕米百万上贡天家。然地狭人稠，民力将竭。西北多旱，民情素惰，卤莽灭裂，收成之丰歉一听之于天。土旷人稀，未垦之荒土、荒田以亿万顷计”。^{①9}这种不平衡状况，不仅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，而且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，因此须加以调节改变。郑观应主张实行垦荒戍边，其具体内容是：通飭边疆督、抚，将沿边荒地派员探测，先正经界，详细丈量，必躬必亲，毋许疏漏，绘图贴说，详细奏闻。然后综计，一夫百亩，招募内地闲民携家前往。籽粮牛种，官给以资；舍宇堤防，官助其力。附近各省通力合作，岁筹闲款，移粟移民，边帅抚恤招徕，勒以军法。四、五年后，酌量升科。三时务农，一时讲武，仿屯田旧制，设官分治。”^{②0}这见解相似于中国古代晁错等人提出的主张，但由改良派思想家说出，则属鲜见。

“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”^{②1}，因此，郑观应也对治理旱潦问题进行了重点的分析。他揭露了当时水利失修所造成的恶果，指出：“比年北五省水旱偏灾无岁不有，山西之旱一，河南之旱一、水一，山东、直隶之水则至再、至三。每次公私赈款辄至数百余万，皆出于度支正项，或南中义捐。岁岁告灾，其忧未已，而穷民之转徙于沟壑者尚不知几千万人。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也。”^{②2}如何改变这种势态？郑观应主张从两方面进行治理：其一是开通沟渠；其二是广植树木。在他看来，赈灾救荒只是治标之计，而“治本奈何？曰：《周礼》之成规，开渠、种树而已矣。夫井田不能复，而沟洫犹可渐开；富教不易言，而树艺必宜急讲”^{②3}。关于前者，郑观应建议：“每省简一大员为水利农田使，轻车简从，分行各州、县，测量绘画，旧渠之宜复者复，新渠之宜开者开，必顺人心，必随地势，著有成效，优奖超升。并董劝民间：自于田畔多开沟洫，民力不足，官助其成，岁岁修治，毋许湮塞。”^{②4}

如果说郑观应的开渠主张主要继承了古人的做法，那么他的种树主张则以西方国家为楷模，重在强调保持生态平衡。郑观应介绍说：“泰西数十年来于种树之事极为尽心，特设专官如古者虞人之职。自树木广植后，不特名材美木获利无穷，且树旁之田瘠者变而为腴：因树根能吸土膏，能烂沙石，故硗确之地悉化膏腴也。无水者变而有水：因树木能放养气，能润木根，故干曠之区咸资灌溉也。而且根株盘结，沙石化为土壤，松脆变而坚凝，墙岸益坚，堤防愈固，则御旱御水无所不宜。”^{②5}通过生态平衡的维持来防止水土流失，从而达到根治水旱灾荒的目的，这是对近代科技发达的认识产物，郑观应能将这一点明确地提出来，以供国人反思，是有启蒙创新意义的。据此，郑观应对中国古代虽有种树专书，但“汉、唐以来官不过问”的状况不无批评，尤其是到了近代，“燕、齐、晋、豫诸省所有树木斩伐无余，水旱频仍”^{②6}。基于以上认识，郑观应要求：责水利农田使，相劝督率于田侧隙地，广植林木以复旧观，有斩伐者罚赔不贷。至于蚕桑之利及松、梓、果、蓂一切有利之植，尤必随宜广种，以厚民生，岁岁增加。十年则官伐而售之，仍以此款修理川涂，广兴水利。”^{②7}

对于大型河道的整治，郑观应则拟定了具体的措施方案，例如对黄河的治理，他提出了四条措施：其一，“缓上游”。他认为：“河之上游，诸山峙立，当于山下锹塘，谷里通渠，引水停蓄。如本河不得宣泄，则开沟引归别河。若不能另筑别路，可在本河两边开沟受水，皆用堰闸，随时蓄放。”^{②8}其二，“开支河”。郑观应建议在详细勘察的基础上，选择适当地点开浚支河，“浅者深之，狭者宽之，曲者直之，水得归壑，自无倒激。”支河开，

河流分，对势杀矣。取泥之法，可参用泰西挖泥结器船。”^②其三，“宣积潦”，即引导黄河流由几个干涸水道下归江海。“如顺势筑堤束水，能开浅水船往来镇江之大道”。“凡近河海之处，皆堤防，有高至四、五丈者。或于堤上开路达水，以备宣泄，而资灌溉，酌量参用，可免壅塞之虞。”^③其四，“开大湖以蓄水”。他认为：黄河之开湖，莫便于口外蒙古之地”。^④此举可收“不侵占土田”、“可以时蓄池”、“可以资灌溉”，^⑤以及便利水道、发展渔业等多项效益。这表明，郑观应是始终围绕着农业生产来谈水利的。

以上郑观应的农业主张基本上是宏观层次的，在特定地区农业的发展问题上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农业观点，其中包含着近代农业商品生产的浓厚色彩。例如，他在分析海南岛的农业经济时，主张依据当地的自然条件，大力发展咖啡种植，他指出：“外国洋人饮食咖啡与糖、面为日用所必需，虽外洋种植繁滋，仍不足用。而种咖啡之法，其初年则绕树离离，逾年则积实累累，年愈久则实愈多，其利愈大。无所用其培植，亦无所用其人工，得南方之热度而发生最良。于收结之时妇稚皆可采摘。琼地素不产茶，植此一物可抵茶之一端，而其工较植茶尤易，其利较茶为数倍”。^⑥这种见解从扩大外贸的目的出发，经过成本比较，确定某一地区最为有利的农产品种植，具有显著的近代经济理论特点。

（作者工作单位：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）

注释：

① 郑观应卒年据夏东元最新考证，参见其所著：《郑观应传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11月版，第264页。

② 例如毛泽东于1906年到1909年间，“开始接触到一些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的著作，尤以郑观应的《盛世危言》对他影响最大，萌发了救国热情”（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》，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，第491—492页）。

③④ 《盛世危言·商务三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，第614页。

④ 《盛世危言·商战上》，《郑观应集》，第591页。

⑤ 《盛世危言·商务三》，《郑观应集》，第607页。

⑥ 《盛世危言·商战下》，《郑观应集》，第595页。

⑦⑧ 《盛世危言·垦荒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739页。

⑧ 《盛世危言·农功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738页。

⑩ 《盛世危言自序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234页。

⑪⑫⑬ 《盛世危言·农功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737页。

⑫ 《盛世危言·农功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735—736页

⑬ 《盛世危言·农功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736页。

⑭ 《盛世危言·农功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737—738页。

⑮ 《盛世危言·农功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736—737页。

⑯ 《盛世危言后编·〈美国种植棉花法〉序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下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，第505页。

⑰ 《盛世危言·垦荒》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740页。

⑱ 《恩格斯致马克思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，第28卷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，第263页。

⑲ 《盛世危言·早潦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743—744页。

⑳㉑㉒ 《盛世危言·早潦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744页。

㉓㉔ 《盛世危言·早潦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745页。

㉕ 《盛世危言·治河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747页。

㉖㉗㉘ 《盛世危言·治河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748页。

㉙ 《盛世危言·治河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749—750页。

㉚ 《盛世危言后编·上粤督张香涛制府并倪豹岑中丞拟抚琼黎暨开通黎峒山川道路节略》，《郑观应集》下册，第499页。